

清末川滇边务 档案史料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编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

中华书局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上 册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编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

中 华 书 局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中 册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编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

中 华 书 局

22, 26, 27
176
2:3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下 册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编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吴广义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全三册)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编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兴胶印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40 印张·2插页·887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50册 定价：22.50元

ISBN 7-101-00502-0/K·218



图1：川铸藏元

斷 碑

欽命督辦夷務監運使銜即補道軍功加三級史

給教斷卻以昭遵守事照得生員等管地方各有疆域不特政教事系朝廷在內

古訓精不注經本道奉

[illegible]

右斷牌給白利土司工布次珍達桑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道

图 2: 断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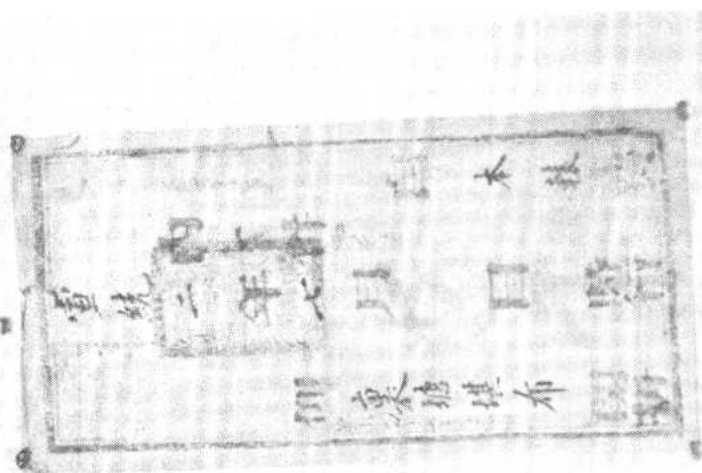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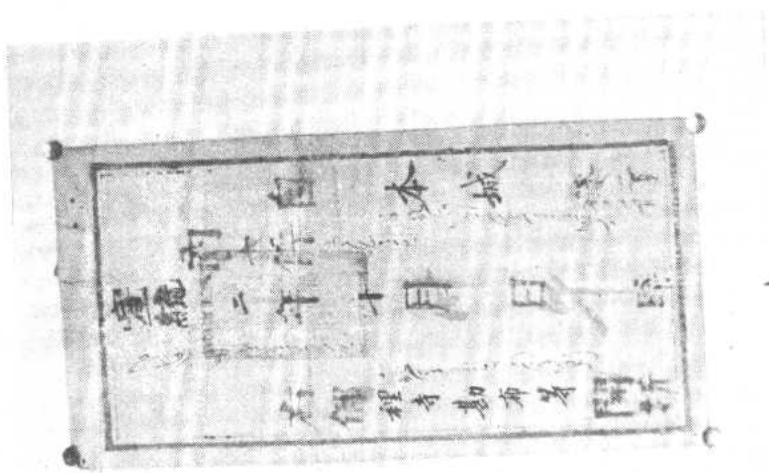


图3：函件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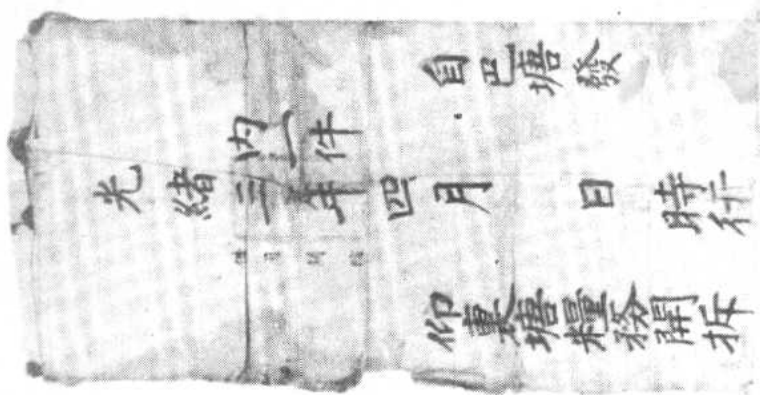


图4：函件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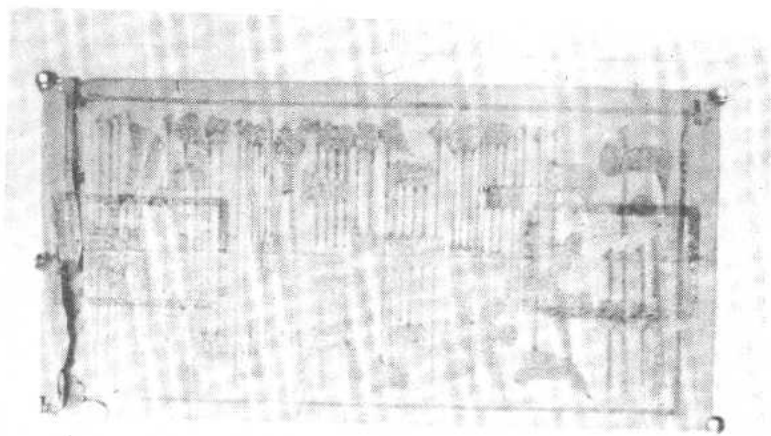


图5：封条

前 言

自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势力抵北印度后，即谋伸展其侵略势力于我国西藏，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和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两次派人进入西藏，企图与西藏地方当局建立通商关系和直接联系。英国在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唆使占据克什米尔的森巴（锡克）入侵西藏，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又提出克什米尔与西藏划界通商问题，企图从西藏打开进入我国西南的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利用《中英天津条约》取得的传教、游历、通商特权，亟谋侵入西藏，而法国则把它的教会势力伸入到川、滇藏区。在英国侵占缅甸后，又图谋“穿插藏地”，打通印緬；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和川边藏区侵略的步伐。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也把它的魔掌伸进了西藏，形成了英、俄角逐的局面。而昏庸无能的清统治者，在外国侵略者节节进逼的形势下，却采取屈膝投降的政策，使藏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反而受到种种压制，这就加深了清王朝与藏族人民的矛盾。英、俄则又乘机挑拨离间，企图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煽动分裂情绪，从而使西藏局势愈形复杂。1904年（光绪三十年），英国乘日俄战争沙俄无暇顾及之时，大举武装侵藏，迫使西藏地方当局签订城下之盟的《拉萨条约》，使西藏处于危急存亡的境地。

西藏与川、滇唇齿相依，西藏安危，与川、滇息息相关。设若西藏不保，川、滇则失其屏障，就将为外国侵略者深入我国腹地以可乘之机，这不能不使清统治者感到极大的震动。于是，改弦易辙，经营

川、藏，以四川的人力财力物力应援西藏，并进而经营西藏，以挽救西藏危局，就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急务。但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川边藏区，却处于土司封建割据状态，交通闭塞，生产落后，要加强川藏联系，必须首先经营川边藏区。因此，清政府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在巴塘招民开垦，并决定在察木多（今昌都）添设大员，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居中策应，筹防练兵”。同年10月，四川总督锡良奏准将原隶雅州府的打箭炉（今康定）同知改为打箭炉直隶厅，除继续管理关外土司事务外，并将雅州府属的沈边、冷边、咱里等土司及泸定桥巡检一并划归管辖，以加强对川边的管理。

1904年12月，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赴察木多任所，途次巴塘，奏请暂留巴塘屯垦训练，并请重申雍正年间限制喇嘛人数的规定，以限制寺庙集团势力，因而引起了巴塘丁林寺上层喇嘛的不满。同时由于藏族人民对清政府媚外投降的不满情绪的高涨，终于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发生了巴塘事件，凤全及驻巴两法国传教士被杀，巴塘天主教堂被焚。事件发生后，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绅哈布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员赵尔丰会同“剿办”。6月，克复巴塘后，马维骐回川，赵尔丰被任为炉边善后督办，从此揭开了川边改土归流的序幕。

巴塘、里塘平定后，清廷为统筹川边经营事宜，决定设置川滇边务大臣，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7月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首先在巴塘、里塘实行改土归流。

巴塘、里塘的改流，巩固了清政府在川边南路的统治，于是清廷亟谋进一步经营西藏。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2月，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并调其兄湖广总督赵尔巽为四川总督，以便消除畛域之见，把川、边、藏连为一气，用四川的人力财力物力经营边、藏。但因赵尔丰在川边以武力推行改土归流，引起了西藏地方当局的疑惧和责难，反对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并调兵拦阻其

入藏。同年5月，赵尔巽督任，在由成都起程赴藏前，会同川督赵尔巽奏请将巴塘改为巴安府，三坝改为三坝厅，盐井改为盐井县，乡城改为定乡县，均隶巴安府。将打箭炉改为康定府，里塘改为理化厅，稻坝改为稻城县，贡噶岭设县丞，隶稻城县，中渡改为河口县，均隶康定府。设康安盐茶道，统辖新设各府、厅、县。10月，赵行抵打箭炉，时德格土司二子多吉生格和昂翁降白仁青争袭，赵奏请前往办理，次年7月，昂翁降白仁青兵败逃往西藏，德格遂平。1910年（宣统二年）4月，赵尔丰会同川督赵尔巽奏请将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流，改设登科府，德化、白玉二州和石渠、同普二县，并设边北道统辖新设府、州、县：

在西藏地方当局坚决反对赵尔丰入藏的形势下，清廷于1909年（宣统元年）3月免去赵尔丰驻藏大臣职务，专任边务大臣，并决定派四川新练陆军二千人入藏，将察木多、乍丫（今察雅）拨归边务大臣管辖。7月，川军由成都出发，11月到达察木多，赵尔丰亦于是月由登科抵达察木多布置护送川军入藏事宜。在北路，时藏军据察木多以西的恩达一带，赵尔丰派边军由恩达沿硕般多、洛隆宗、边坝川藏大道前进，川军则由三十九族（今丁青）间道入藏，次年2月12日（正月初三）抵拉萨，十三世达赖出亡印度。在南路，因藏军在江卡一带调兵拦阻，赵尔丰派管带顾复庆进兵江卡、贡觉；派管带程凤翔进兵桑昂曲宗。1910年（宣统二年）2月，程营进驻桑昂曲宗，3月，进驻杂瑜。赵尔丰先后奏请将察木多改为昌都府，乍丫改为察雅县，恩达改为恩达县，贡觉改为贡县，江卡改为宁静县，桑昂曲宗改为科麦县，杂瑜改为察隅县，均隶于昌都府。并派员招抚察隅沿边各部落，奏请将原梯羹拉改为原梯县，妥坝改为归化州，木牛甲卜设县丞，隶于归化州。同年5月，孔撒土妇央机携其二子带印潜逃，赵尔丰派兵捕获，次年2月，赵尔丰奏请将孔撒、麻书两土司改流。

1911年（宣统三年）3月，民政部以所谓预备立宪，扩充民治，奏准各省未改流土司一律改流设官，加快了川边改土归流的步伐。同月，赵尔丰派统领凤山率军往攻得荣浪藏寺（又名诺茸寺），该寺归诚，设得荣委员。巴塘所属冷卡石亦输诚归顺，划归三坝委员管辖，于是原有巴塘土司之地，全部改流设官。4月，清廷调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以四川布政使王人文任川滇边务大臣。时川边土司未改流者尚多，特别是瞻对问题尚未解决，赵尔丰不能即行回川赴任，因此商同川督赵尔巽分别奏请以傅嵩林代理川滇边务大臣，以王人文暂行护理四川总督。5月，赵尔丰交卸边务大臣，并会同代理边务大臣傅嵩林继续办理改土归流。赵、傅由巴塘至甘孜，会檄灵葱、白利、倬倭（朱窝）、东科、革什咱、鱼科、明正等土司缴印改流，并会檄驻瞻对藏官限期回藏。当时川边土司改流，已成疾风落叶之势，瞻对势孤，不能再仍前违抗，因而瞻对藏官巴登郎加遵限离瞻回藏，给银十六万两，作为同治初年藏军平定瞻对土司工布郎结之乱的军费的补偿，于是久悬未决的瞻对问题，得以解决。赵尔丰奏请将瞻对改为怀柔县，甘孜改为甘孜县，炉霍屯改为炉霍县。

赵尔丰于1909年督兵追击昂翁降白仁青至杂渠卡时，曾示谕俄洛（今果洛）各部土官“投诚”，6月，派代表来甘孜，表示归顺。7月，色达三部头人亦具禀归顺，赵尔丰奏请设果罗、达威两县。

同年6月，驻藏大臣联豫急电赵尔丰请派兵会攻波密，赵奏派边军统领凤山为波密督办，与驻藏清军分东西两路会攻，波密总管白马翁青逃往仁进邦，为该处头人所杀，7月，波密平定，由驻藏大臣分设理事官管理地方事务。

同月，赵、傅由甘孜至打箭炉，会檄鱼通、倬斯甲、崇喜、毛丫、曲登等土司缴印改流，赵尔丰随即入川，途中将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改流。

7月，明正土司所属鱼科土千户抗不缴印改流，并与明正土司

阴谋恢复土司旧制。傅嵩林派兵往攻，鱼科土司降登宜错逃往上罗科被杀，鱼科遂平。赵尔丰奏请将明正土司改流，以道坞改为道孚县，九龙改为九龙县，巴底、巴旺改为丹巴县，以泸定桥巡检辖区改为泸定县，统辖于康定府。

傅嵩林在办理明正土司改流后，复出关至泰宁，收回乾隆年间赏给泰宁寺差民七十余户，改流其地。并檄飭察木多、乍丫两呼图克图缴印改流，9月，设乍丫理事官，并将察木多粮员改为理事官，管理地方行政事务。

从1905年巴塘土司改流，经过七年时间，川边土司至此已全部改流，为建省奠定了基础。因此，赵尔丰、傅嵩林先后奏请于川边建省，拟定名为“西康省”。时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全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夕，清廷无暇顾及，遂搁置未决。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宗教、习俗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并采取了种种措施。

在政治上，废除土司及其所设置的马瑱、协廐、更占、百色、古噪等大小头目的统治系统；禁止土司、寺庙干预词讼和一切地方行政事务；废除土司、头人的蓄奴制度，将世世为奴的“小娃子”一律改为雇佣关系。在废除土司、寺庙政治特权之后，根据“地足以养其民，民足以养其官”的原则，建置县治。县设委员一人，管理全县事务。每县分为中、东、南、西、北五路，每路设保正一人（汉人较多地区，增设汉保正一人），常驻委员衙署，协助委员办理征粮、诉讼等事务。每路分为若干村，以百家或至少八十家为一大村，设村长一人。因居住分散，有数家、十数家或二、三十家为一村者，设小村长一人，协助村长办事。保正、村长由居民公举，三年一任，连选得连任。过去土司属下的大、小头人亦可选为保正、村长。如办事不公，得随时另选更换。保正、村长由公家给予口食，小村长不给口食。

对于遵从改流的土司，则视其土司等级分别授以都司、守备、千

总、把总等世袭职衔，并酌留其原有庄园土地一部分或全部作为养赡，少数还另给养赡银两，以示体恤。对抗拒改流的，则没收全部财产，并予治罪。

在经济上，规定改流后的土地为封建国家所有，不准买卖。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留给土司作为养赡的土地，只能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除扣除籽种后，与佃户均分。规定耕种土司、头人、寺庙土地的，只能称为“佃户”，不得称为百姓。废除步差、牛差、马差等无偿劳役和各种摊派，骑驮乌拉按站给予脚价。规定农牧民只向清政府交纳粮税，纳粮标准，将土地分为三等：上等地下种一斗，纳粮一斗二升；中等地下种一斗，纳粮一斗；下等地下种一斗，纳粮八升。遇水旱灾害，或减，或免，或酌量赈济，视实际情形办理。饲养牲畜者纳税。规定：羊十只合牛一只，马一匹合牛一头。每家除马牛羊合计十三头免税外，其余多养牲畜，每牛一头，纳税银一咀（三钱二分藏元的四分之一），牲畜不及二岁者免税。

此外，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并规定清理高利贷办法：“如借放在五年以前者，自本年起，本利均不准收；在三年以前者，准予本年将本收回，不准收利，作为本利收清；在二年以前者，准收本年之利，并将本收回。”宣统三年明正土司改流时，重新改订为：“凡所借之债，已经收过四年全利者，作为本利收清；收过三年全利者，准收本十分之三；收过二年全利者，准收本十分之六；收过一年全利者，准收本十分之九，作为本利收清。”

鼓励垦荒。垦分官垦与民垦。官垦由内地招募农民出关开垦，由公家给予路费。垦民住房、农具、耕牛、籽种由公家贷给，俟垦民收获粮食后，逐年偿还。垦民由公家日给口食者，其垦地所出稷麦，全部归公；第一年由公家日给口食，第二年自备口食，公家只给籽种，照五成纳粮外，再将籽种还给公家，第三年后，照章按等纳粮；自备口食开垦者，三年内免纳粮，第四年照章按等纳粮。荒地垦出后，垦

民可以佃种；如能缴还开垦所费银两，由地方政府发给文契，作为垦民永业。民垦由村民开垦各村荒地，垦民须先申报愿垦若干亩，具结存案，限两年内垦毕。每人每月垦地一亩、或至少半亩，始可向公家借贷口粮。开垦之地，作为民业，三年之后，勘丈发给地契，按亩计科。

为了扩大垦务，各县进行了可垦荒地和水源调查，兴修了一些小型水利。有些县还分别设立农事试验场、农业改良所或农牧研究会，从内地引进水稻、小麦、洋芋、包谷、荞子、高粱以及各种豆类和蔬菜品种数十种进行试种，所产良种，向农民推广，并仿制内地农具，改良农业耕作技术。

川边野生植物丰富，河口（今雅江）利用野桑养蚕，并成立蚕桑局，由关外学务局设立蚕桑学堂，招收藏族青年女子学习养蚕。鸡贡、察隅一带野生漆树、构树甚多，驻防边军派勇割漆造纸。

兴办工厂。1908年拨银二万四千两在巴塘设立制革厂，从日本购进制革机器，并选送藏族青年三十人到成都学习制革技术。巴塘还建立了印刷厂。利用巴塘择镰顶可制釉料的原料，在附近官话学堂附设制陶班，招收官话学堂学生学习制陶技术。此外，在稻城兴办了纸墨厂。

川边盛产砂金，1908年聘请曾在美国留学的刘轼轮，任为关外矿务工程师，进行勘探，并制订开办金厂章程，招藏汉商人集资设厂开采，征收课金作为边务经费。并派营勇在德格扩络垞开办金厂，招收附近藏民到厂学习挖淘砂金技术，并给予口食，学得技术后，自备口食开挖，所得砂金照市价售予该厂。此外，在同普设立官办铜厂，开采铜矿，在察隅梭里山开采银矿，均用土法冶炼。

川藏崇山阻隔，交通困难。赵尔丰于护理四川总督任内即着手修筑成都至巴塘大车路，1910年，赵尔丰会同川督赵尔巽奏请修筑川藏大车路，由川、边、藏分段负责修筑。成都至打箭炉段，由四

川拨款修筑;打箭炉至察木多段,由边务经费拨款修筑;察木多至拉萨段,由驻藏经费拨款修筑。并在雅州设立车务处,制造大车。但以工程浩大,虽对一些地段进行了勘修,未能全线竣工通车。在河口雅砻江上修建了钢丝吊桥,由上海华法公司承包,派比国工程师设计修造,为川藏交通带来了便利。

川藏文报往来,向由驿站传递。1905年马维骐、赵尔丰进兵巴塘时,即着手安设打箭炉至巴塘电线,后又接至察木多。根据1908年《藏印通商章程》规定:“一俟中国电线已由中国接修至江孜,英国可酌量将由印边界至江孜之电线移售与中国。”为了收回印边至江孜一段电线,准备接修川藏电线,并派员勘测了由察木多至亚东的线路,但因经费究应由边务经费抑由驻藏经费划拨问题,争执不休,未能接通。

1910年,西藏设立邮局,为接通西藏至打箭炉邮路,利用川边原有塘站传递,因而西藏与内地得以通邮。

川边藏区向以“克”为衡量单位,但无一定标准,“收纳粮税,易于弊混”。因而改革度量衡制,实行与内地统一的度量衡。即:度制以营造尺为准;量制以合、升、斗、石为准,并规定每斗重库平三十斤;衡制以库平秤(十六两)两、钱、分、厘为准。并制发官斗、官秤分发各县仿制使用。

1893年(光绪十九年)《中英藏印续约》规定,俟百货免税五年之后,允许印茶入藏,这对边茶销藏是一大威胁。为了抵制印茶,清政府一面打破成例,允许茶种入藏播种,同时组织出产边茶各县茶商集资五十万两,成立边茶公司,对边茶的产、运、销统一经营管理,以图增强竞争能力。

由于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印币卢比大量流入西藏,并在川边行使,价值甚高,军民蒙受损失。为了抵制印币,因此于1909年拨银二十万两,仿照印币卢比大小铸造三钱二分藏元运边行使。随又